

○ (英) 罗宾·赫钦 / 著 ○ 袁长燕 / 译

包玉刚传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包玉刚传

● (英) 罗宾·赫钦 / 著

● 袁长燕 / 译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赣)新登字第005号

书 名: 包玉刚传
作 者: (英)罗宾·赫钦 袁长燕 译
出 版 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印刷十一厂
开 本: 787×1092mm 1/32
印 张: 3.875 插页: 6
字 数: 10万
版 次: 199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3.20元

ISBN 7—80579—205—4/I·169

邮政编码: 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当港龙波音737飞机载着包玉刚爵士全家，穿越晨雾中滚滚翻卷的云朵，向古城合肥下降时，机舱里的喇叭响起了四十年代以来一成不变、古板刻套的声音：“祝愿旅途愉快”。

这不是包玉刚爵士五十年前离家后的首次衣锦还乡，而是来察看他们全家为纪念他七十华诞而在合肥、宁波和杭州实施的若干项目的进展情况。

宁波在约一百五十年前作为通商口岸向外国人开放以来，一直是上海的穷朋友。今天，它是十四个对外贸易、吸收外资的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拥有近五百万市民的经济计划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它已经吸收了一亿多美元的外资，三分之二以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原宁波籍人士。发展项目中引人注目的是北仑深水港中引进的设备——已在接纳来自澳大利亚和巴西的大型矿石船——以及一座钢铁厂。

包玉刚的名字对于宁波人和香港人一样如雷灌耳。拥有二千多万吨吨位的大型船队，包括许多艘巨型油轮，远远超越了主要海运公司的商业船队，这本身就是举世瞩目的伟绩。为避免在大萧条时期惨遭灭顶之灾的决策，益发值得注

意。他此后从事不动产、航空、旅馆业、电缆电视与远距离通讯、电器产品制造、零售与银行业的经历，更为他的社团职业戴上一顶顶桂冠。尤其是他对宁波的捐赠和投资，且不提在中国其他城市，据说是海外商人在这座港口城市投资总额的两倍多。

这本书详述了他的业绩。他基于同包玉刚爵士、他的家庭成员、同事们、商业合伙人、老朋友们，以及那些在他不知疲倦、成效卓著一生中与他接触过的人们海阔天空的会谈记录。还查阅了大批文件和文章。世界各地的记者在诸多杂志的商业及金融栏目里，为他写过有根有据的文章，这是带人情味的评价，通过他的同事及合伙人的眸子得以显露。

每个富可敌城、品德高尚的人都与旁人截然不同，取决于他如何达到这种地位，以及对别人的显著影响。下面的书页在他人生道路上聚光，揭示他如何敢于冒险，仅仅只有中学教育和有限资金的背景，缺乏专有知识和经验，却能脱颖而出在此时此刻或彼时彼刻一跃而成世界上最大的船主，更不消提特洛伊有倾国之貌的海伦，她虽然拥有大量船只，但根本不敢侈谈吨位。

不管以什么标准衡量，它总是引人注目和异乎寻常的一生。传记从他1918年在宁波诞生为始。据说他是中国文学与历史上一位妇孺皆知的名人——侠义执仗，机敏过人——的第二十九代直系后裔。那位名人，就是洞察若微、雄才大略的包公。

有着如此高贵和荣耀的血统，包玉刚以激励后代，兼以同代人永世赞誉的方式，奠定了他们一家的地位。下面就是他的故事。

前 言

玛格丽特·撒切尔

我本人对包玉刚爵士极为敬佩，我丈夫和我结识他颇有年头了。所以借此机会在罗宾·赫钦为他写的传记中说几句话，我倍觉欣喜。

包玉刚爵士出类拔萃的才能得到全球认可，口碑甚佳。然而在香港——该地区具有独一无二的商业精神气质——他的成就存在着最紧密的联系。香港为他非凡的企业家才干与精力达到巅峰提供了种种方便。

包玉刚爵士亲眼目睹香港自由资本主义环境下他的企业蓬勃发展。他的功绩——在广泛的领域中包括海运、陆运、空运、金融与保险、旅馆业与房地产——映射出香港作为贸易、制造和金融中心，在战后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功。

包玉刚爵士的拳拳爱心远远超越商业与金融世界的范围。他是香港慈善团体与艺术界急公好义的赞助人。他对高等教育及学习尤为兴趣盎然，不光局限为香港造福，而且向世界各地送暖。他决定在家乡宁波创建的一所大学，是他慷慨大度与卓有远见的见证。他为我国许多教育项目奔波操

劳，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这本传记恰如其分地赞誉了一位卓尔冠群、成就赫赫的人物。我祝愿他在未来的事业中无往不胜。

前 言

绝 不 妥 协

（此处文字因倒置而模糊，无法辨识）

目 录

前言	玛格丽特·撒切尔	(1)
序言	罗宾·赫钦	(1)
第一章	履安堂	(1)
第二章	动乱年代搞金融	(10)
第三章	飞往香港	(17)
第四章	漂动的财产	(27)
第五章	身处大海镇定自若	(36)
第六章	一年三十艘船	(50)
第七章	大衰退	(56)
第八章	董事会会议室里的摊牌	(66)
第九章	白色骑士	(76)
第十章	步入上流社会	(87)
第十一章	合家欢聚	(96)
后记		(114)

第一章 履安堂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角色朱丽叶叹息离别是既喜且悲的经历，对一位陷入热恋的年轻情侣是恰如其分。但是在宁波，离别通常是迈向成功之路的第一步。对今天成千上万名定居在世界各地的宁波籍男男女女而言，这是无可置疑的真理，他们的经历足堪证明。

对那位在旧时代出生、长大，并在中兴村地方小学启蒙的雄心勃勃的青年来说，情况毫无二致。这所一百多年前创建的小学，得益于一名叫叶正中的原学生的捐赠，进行了扩建。当年，他移居到离老家不足二百公里的港口城市上海，找到了一份在浑浊的黄浦江上从浦东到外滩的摆渡船上当船夫的差使。

有一天，一位美国商人跨进船舱，坐下身，要求摆渡去外滩他的办公室。一到对岸，他跳下舢板，疾步离去。叶正中这位年轻的船夫，一会儿后发现美国人坐过的座位上有一只钱包。他在学校里受过的启蒙教育之一，是诚实的重要性。他拿起装着一厚叠钞票的钱包，把它交给雇佣他的轮船公司主管。经理对这种诚实举动惊讶不已，把这位年轻人召进办公室，委托他监督帐户开支并保管钱财。

血气方刚的叶正中不久爬上了买办的地位，成了一位富人。眼下，他的儿子们和孙辈都住在香港，全是颇有劳绩的商人。那所教给他终生受用的诚实教育的学校，于是收到了一位感激不尽、慷慨大方的毕业生的遗赠。

包玉刚比他的大多数同学更为幸运。他们家在中包村生活了许多年，是家财殷实的小康人家。透过他底楼卧室的窗户，可以眺望他父亲舒适惬意的祖居的院墙，微风吹拂的水稻田伸展到波光涟漪的宁波湾蓝色海域，雾气迷蒙的小岛浅丘位于正对面。

他能够了望到岛屿同陆地之间宽阔的海峡，中国内地的贸易通过它与外部世界交流。

远在上海从泥泞不堪的河滩变为长江流域的商业贸易中心之前，位于甬江端头的宁波，早已吸引了各种商贾和实业家。据说那里七千年前就有石器时代的古人传播文明。它得名于1381年，意味着“波澜宁静”。对那些几百年来摇着平底帆船沿中国海岸来回贩运货物的船主们来说，它提供了一座集山脉、天空、田地和谐统一的深蓝色海水的港湾，其他港口望尘莫及。

几个世纪以来，它也同外国殖民主义者打过不少交道。有一段时间，它据说成为一批古犹太人的团聚之家，犹如河南省的开封市。那得回溯到汉代。葡萄牙人驾着三角帆快船于十六世纪尾随瓦斯科·德·加马^①蜂拥而至，在那里占据了朝不保夕的立足点。他们最终被驱逐出境，朝南移居到珠江三角洲畔山峦起伏的岬角澳门。以后，到十八世纪，荷兰

^①葡萄牙航海家（1469—1524），是第一个两次绕过好望角（1497）并航行到印度的人。

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船主们以贸易与探险的海盗式气焰侵入该地。中国清朝统治者对那些风帆呼呼的武装船只和居心不良的船员的入侵深恶痛绝，对饱经海风的海员们引诱单纯质朴的宁波人恼羞成怒。朝廷颁布法令，把他们驱遣到远方的广州，让他们在非贸易的夏季与澳门的葡萄牙人分享一席之地，并允准他们在短暂的冬季进行贸易。对朝廷而言，他们在那里是眼不见心不烦，任其内哄、争吵，尤其是荷兰的东印度人企图排挤他们时。野蛮人理该远在天边。

近一百年来，除开偶尔有些无执照者冒险潜入海岸贩卖鸦片和分赠《圣经》外，外国人都住在远离宁波的地方。为控制那些入侵的商人，中国政府决定设立由富户官员组成的贸易机关联合商行，在广州专门与西方商人从事赚钱的买卖。

多年来，西方船只运来的大宗贸易商品是鸦片。当中国政府试图终止这种行为时，战争爆发了。清朝统治者败北后，被迫向外国人开放通商口岸，使他们能同中国商人建立并保持贸易关系。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在此之前，宁波附近的舟山群岛被视为新殖民地的选择地。宁波最终被指定为通商口岸，尽管那时上海是利市数倍的长江流域贸易终端。在北方邻居的挤迫下，宁波仅承担了经由上海的贸易量的十分之一，只有四家外国公司在那里设立了办事处。1861年，太平军占领了该城。五个月里，在造反者的规定下，它的日常生活和贸易瘫痪一团，徒唤奈何。太平军首领洪秀全蔑视北京政权，封锁了大运河，中断了同北方的稻米交易。那些神通广大的商人逃离日渐萧条的海岸，确实不足为奇。

几代人之前，包氏家族的一支定居在该市郊区。他们都是殷实商户，其血缘可追溯到高贵卓越的先祖，虽然只能在家里悄悄摆谈而已。如果不是安徽省附近的学者接上这种联系，再过七十年，也还湮没无人知。这个家族与流芳百世的包公同出一祖。据说书人讲述，包公之所以每案必成，在于他有一把通往地狱的钥匙，使他能同无辜被害者对话。结果是他创造了把正义赋予合肥及其周围地区的一贯正确的记载。这还不算祖传世系的发端，因为研究者们把它上推到一千五百年的秦始皇以前，他统一了中国，修筑长城，焚烧书籍，活埋了四百六十名儒生。这个家族由于其荣耀的先祖流芳百世而倍感兴奋、尤觉荣光。

当时，作为七个孩子中的老三，包玉刚降生在包家这个按中国标准衡量舒适而富有的家庭。父亲包兆龙从双亲手中继承了远在汉口的制鞋厂。汉口是长江上一座繁忙的河港，也是向外国商人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包玉刚，孩子们中最有出息的一个，被作为承袭父亲那家制鞋厂的后代精心培养。除了在中兴小学读书，家聘的一位青年教师谆谆告诫他不仅要精通汉语，而且要掌握基础英语。因为，在通商口岸经商，只有懂得外商的语言，业务才能突飞猛进。然而，包玉刚兴趣广泛，熟稔各种运动诸如排球，时刻准备在班上、在家里夺取桂冠。他生于1918年，属马年。七年前，清朝最后一位统治者慈禧太后被孙逸仙博士领导的共和派人士在北京赶下龙座，气绝身亡。

那位年轻的理想家和革命家，充满爱国主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西方的理想主义。象太平天国造反军首领那样，这位广东人进军北京治理国家，不久却被军阀、王位觊觎者袁

世凯撵下了台。一年后，袁世凯同样在劫难逃，各省军阀争吵不休，无论是皇帝还是总统，都无法使四分五裂的中国保持平衡。较之大多数家庭，包氏家族颇为幸运，躲避了种种厄运，继续居住在平静的宁波，在太平军造反兵席卷该地区的混乱中幸免于难。

民族主义者的共和主张深入人心。包玉刚记得，学校里每天的例行仪式，是同学们站在操场上或教室里，静默一分钟，目睹青天白日旗冉冉上升，背诵孙博士的政治遗嘱。遗嘱号召“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博士是包玉刚早年崇敬的英雄之一，他在1925年逝世后，蒋介石总司令试图借助北伐达到统一中国的目的。包玉刚欢迎国民党新领袖进行的革命，他们决心结束古代以来各省喋喋不休的争吵，让中国强大起来。

拥有一百多名学生的中兴小学，为附近的孩子们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教育。十年前，另一位学生觉得宁波的天地太小，难以施展他的雄心。他离家去投奔国外娱乐界及电影界声誉卓著的华人。他名叫肖伦仁，今天象包玉刚一样，由于其功绩被授予爵士称号。

对包玉刚，他的两位兄弟和四个妹妹（此后因天亡只剩三个）而言，学校激发了他们的智慧，唤醒了他们离开宁波的幻想。他们相继出走，去寻觅机会和佳境；要不，为躲避持续不断地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笼罩在他们头顶上的战争阴云。包玉刚决定去照看父亲在汉口的制鞋厂，让哥哥、妹妹在家陪伴母亲、教师和佣人。

在他们家里，主院子外有一间屋里设有供桌，供奉着在农村祈求普降甘霖、五谷丰登的神灵。一块硕大的黑匾，上

书三个大字，金光闪闪地照耀着堂屋。三个大字是“履安堂”。无论是谁命令制作这块匾额，它意在保佑这个家族的全体成员在人生旅途中都能吉祥如意、无忧无虑。包玉刚对他的出征采取稳扎稳打的做法，下意识地把那三个字作为终生的受用的指导原则。

1931年，包玉刚从一条在广阔而混浊的长江上航行的上水船步下陆地时，汉口正处于激战之中。此后六年，在汉口陷入更加阴险狡猾的日本侵略者手中之前，包玉刚通过在夜校读中学课程来度过青年时期，海绵吸水般吸收簿记和商业原则的基本原理。经过几次挫折和失望，他发现制鞋业不管如何值得、需要和有用，毕竟不是他终生从事的职业。小心谨慎的步履应当迈出，但穿的却是在自己商店里销售的、别人制作的优质鞋。

那时候，包玉刚觉得父亲并不是他心中运筹帷幄、深谋远虑的商人。他的鞋店位于租界外，出售传统的布鞋，生意日渐萧条。包玉刚赞同店员们的主张，即把鞋店迁进租界，同时推销胶鞋和皮鞋。然而，赚来的钱并没用在业务的改善而花在他父亲私人的享乐上。这不仅对他挚爱的母亲是一种痛苦，家族的制鞋业也一落千丈。

虽然没有哪种西方商人的新信仰对包玉刚产生影响，他却变得郁郁寡欢，反复思量如何自食其力。哪怕汉口到处是餐馆、酒吧和酒店，歌女们遍布各个码头，但他对此视而不见，选择了终生遵循的价值观。对虔诚的佛教徒或耶稣会会士，这些举动将备受赞誉；对无神论者的包玉刚，它们是出乎意料的，反映了他强烈的自我约束和正直道德。

他迫在眉睫的需求是不断接受教育。白天他要在父亲的

鞋店里营业，只好晚上学习。他继续上英语口语课，数学也学得不错；他还喜欢体育运动，但他回忆说“自己身体并不强壮”。有一天路过日本邮船公司在汉口的轮船公司的院子，他瞥见一群日本青年在打网球。他羡慕他们的才能、敏捷和享受运动的机会。这种记忆超越一切，促使他心智益健、增强体魄。这些决定任何成年人都会做出，但作为一个认真严肃的青年，处于不断发生的政治混乱的环境下，怀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那些誓言对当时的中国青年是相当典型的。他请教一位朋友什么是强身的最佳之道，他被忠告说做俯伏撑、跳绳、跑步和游泳，他言听行随。他想得更远，发誓不管干啥，工作或求学，干则必佳，以图自力更生，不浪费时间和金钱——显示出同龄青年中少有的决心和热情。他的格言是：“别自暴自弃。”

即使有他父亲的财富和榜样，他也不是享乐主义的追求者。相反，他选择的是梦寐以求能与中国的改革与现代化新纪元同步的职业。有一天，他向父亲宣布，他对卖鞋兴味索然，他已报名接受一家外国保险公司的培训。最初它叫阿恩霍达贸易公司的保险部，一家中国沿海非常著名的商号。之后它扩展成保险公司，取名雇主责任保险公司。他父亲极其明智地赞同了他的意愿，祝他好运，并允诺帮助和周济他。当时上下辈之间没有“代沟”，家庭生活也未见分裂。

既已决定投身新职业，包玉刚的双亲觉得，他已步上人生的第二阶梯，该是婚娶的时候了。革命赶走了皇帝，拥有兵权的强人取而代之，但却没改变中国世代沿袭的习惯和传统，即由父母为儿子指定对象。包玉刚是个孝子，还不满二十一岁，母亲就通知他，媒人在黄道吉日为他物色了

一位年轻姑娘。接着是商量订婚事宜，与其说是影响，不如说在讨价还价，因为哪怕老于世故的中国人都对这类常识耳濡目染。结婚的时间和仪式由父母决定，虽说以新娘的名义进行，而且她的生辰八字必须由算命先生算过，以便确定他们的结合会多生贵子，白头偕老。

那位淑英姑娘也是宁波人，其父同包玉刚家一样是中产阶级。包玉刚仿效长辈们世代相传的结婚习惯与传统，煞有介事地加入迎亲队伍，写下了三份誓约，参加了六种仪式。婚礼在包家的旧居操办，把两个家庭和亲戚关系结为一体。在吃完喧喧嚷嚷的丰盛晚餐后，接着是互换吉祥物，叩头，点香，敲锣打鼓，放鞭炮。这对年轻人第一次在全然陌生的情况下被推进履安堂楼上的新房里。

初次接触的尴尬和羞怯不久便烟消云散，他们的婚姻是一种联合，受到美满的祝福，发展成牢不可破的终身伴侣关系。包玉刚的父母慧眼独具。他准备重返汉口，从事选定的职业。但是在1937年，中国正面临新的严峻考验。城市受到日本轰炸机的空袭，日军横扫长江流域，在死难成千成万无辜百姓的南京大屠杀后，汉口再也无法接纳一位新郎了。

在沿岸的诸多沉船里装满炸药从阻止日军的推进，洪水冲垮年久失修的堤岸，淹没平坦的农田，外国人登上英国战舰开普敦号，与英国妇女儿童一起撤退。在汉口陷入敌手之前，包玉刚与七十位同事乘火车换汽车前往湖南，之后又去上海，而他的妻子却留在相对安全的宁波。

1937年秋，上海是座一片混乱的城市。日本陆军、海军团团围城。两架中国飞机把炸弹扔入国际租界，炸死一千多

人，包括外滩地区不少人。一艘停泊在城东杨树浦的日本巡洋舰“出马”号，把枪口对准惊慌失措的平民。数以千计的居民纷纷出逃，有的去了安全的香港，有的逃入中国内地。蒋介石退到山城桂林，远离长江，从那里他既能借战事所需，也可因日军威胁前往重庆。

包玉刚对中国领袖的敬仰之情，随着1936年的西安事变而消失殆尽。当时，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筹谋在西安安排蒋与共产党人会谈。如今，这座城市因发掘出秦始皇坟墓中与真人大小的兵马俑而名闻遐迩。被绑架的蒋没有警卫守护，发觉自己已成阶下囚，怒气冲冲地答应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之后却自食其言，终身囚禁了少帅，并在1949年大溃退时把他劫持到了台湾。

这无疑不是包玉刚心目中的偶像。他在上海觉察了对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人面前无能为力的普遍的失望情绪。他的英雄偶像由坐在轮椅上的美国总统所替代，不仅因为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大萧条的年代中坚强而果敢的领导，施行新政，还在于他顽强地克服了瘫痪的逆境。

然而，包玉刚到上海是干活，不是打仗的。他对自己与国民党休戚与共这一点，没有任何政治兴趣或野心。他在中国中央信托公司保险部谋到一个职位。他追忆往事：“我的业务是战争险，发放因日机轰炸或其他战争行为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金。”他成绩可观，成为十三个准备选入银行担任重要角色的人员之一。随着战争的平静，包玉刚把新娘叫到身边，以后他撤退到昆明和衡阳时，她一路相随。